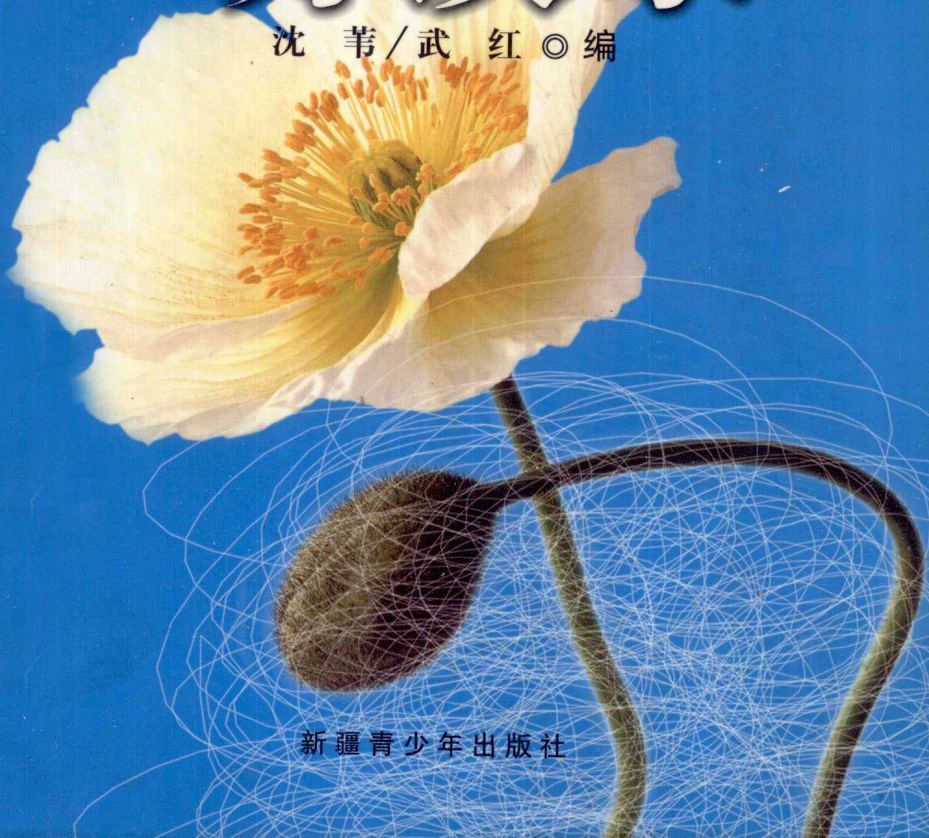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WRITERS

中国作家 访谈录

沈 苇 / 武 红 ©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作家访谈录

沈苇 武红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全学 周英傲 郭逢辉

封面设计:丹阳工作室

中国作家访谈录

沈苇 武红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2.5印张 300千字

2005年1月修订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71-2697-6/I·893 定价:31.3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访谈录近年来较为兴盛,已成为中国作家乐于接受的一种表达和交流的方式,深受读者喜爱。这正是我们选编这本集子的缘起。

当然,这里还有编者个人阅读上的私好和偏爱。与作家主要作品相比,访谈录(此外还包括随笔、日记、书信、言论、札记等“边缘文体”)更为直接、内在、生动、亲切,它形式自由又魅力独具,好比老朋友促膝谈心,在貌似散漫、琐碎中凸现出作家更真切的形象,传达出创造者的真知灼见,因而也更加接近一位作家的灵魂之真。表达,是一个作家的权力和责任,而来自内心深处的表达总是令人向往、倾倒。不仅仅是作品,访谈录同样可以——也往往更能——打开作家通向读者的心灵之门。

作家非公众人物,他有名但又隐秘,其职业的魅力也正在此。读者对自己喜欢的作家总有一种刨根问底穷追不舍的兴趣,越是喜欢他的作品、爱好、情感、观点、立场等等,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过分,因为作品本身往往满足不了人们这方面的好奇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阅读就是“窥视”——对作家丰富而博大灵魂的探幽访胜,而访谈录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和“窥视欲”,揭开了作家神秘性中的“另一面”或“另一个”,使他的形象更趋立体、完整、真实、可信。面对访谈,或机智幽默,或率真热烈,或深刻透彻,或矜持沉吟,或滔滔不绝,或偏执自傲……作家的性情见地跃然纸上,其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近年来访谈录在中国的兴盛无疑与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

的发达是有关的,也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使访谈录这种形式有了某种流行趋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听到作家的声音了,这不是一件坏事。而好的严肃的访谈录应该是内心的真实流露、思想的准确表达和灵魂的坦白交代,也应该达到被访者和访者之间平等交流、倾心交流的水乳交融的境界,使读者感受良多,获益菲浅——以更加亲切随意的方式,作家感染了读者,最终提升了读者。

选编在这里的大多是“王蒙后”的中国作家,大约代表了目前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和活跃之源,正是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中国曾是一个泱泱诗歌大国,时至今日,现代汉诗(新诗)写作也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目前有一种古怪现象是,当人们提到“中国文学界”时,好像专指“小说界”或者别的什么界,而“诗歌界”似乎并不包括在其中。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偏见和谬误。作为必要的反驳和对诗歌的敬礼,我们为诗人们(当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代表)留下了一定的篇幅。需要说明的是,崔健在这里是作为诗人(词作家)的身份出现的,因为在我们看来,崔健首先是一名出色的诗人,其次才是一位优秀的摇滚歌手。

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我们倾慕的作家未能入选,希望在今后——如果有再版机会的话——得到弥补和充实。

目 录

- 编者的话 (1)
- 王 蒙: 访谈录
——答德国友人吴漠汀 (1)
- 张承志: 美则生, 失美则死
——答《环球青年》杂志 (8)
- 贾平凹: 写作与女性
——与穆涛一席谈 (13)
- 周 涛: 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
——答《绿洲》编辑问 (32)
- 韩少功: 九十年代文学的艰难选择
——答荷兰汉学家雷马克问 (47)
- 余秋雨: 关于散文, 读书和艺术修养
——答《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等 (56)
- 张 炜: 文学是生命的呼吸
——与大学生对话录(节选) (70)
- 陆文夫: 答《中国文学》 (92)
- 张贤亮: 访英问答 (98)
- 叶文玲: 美是文学的生命
——答友人问 (105)

中国作家访谈录

- 陈忠实：** 关于《白鹿原》
——答李星问 (117)
- 路 遥：** 诚实的劳动与收获
——答《延河》编辑部问 (134)
- 梁晓声：** 一个中国作家的备忘录
——答 X 小姐问 (142)
- 王安忆：** 感情和技术
——答复旦大学学生问 (151)
- 史铁生：** 答自己问 (162)
- 周国平：** 只有一个人生
——答《婚姻与家庭》杂志记者王红 (182)
- 余 华：** 对两个问题的回答 (197)
- 苏 童：** 写作, 写作者的生命
——答《新闻出版报》记者红娟问 (203)
- 残 雪：** 创作中的虚实
——与日野启三的对话 (206)
- 刘震云：** 影视与文学
——答房学峰问 (218)
- 赵光鸣：** 我已经没有放弃的能力
——答韩子勇问 (227)
- 昌 耀：** 宿命授予诗人荆冠
——答《当代文艺思潮》、《星星》问 (235)
- 牛 汉：** 历史结出的果子
——答《诗刊》记者晓渡 (243)

中国作家访谈录

- 杨 炼： 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
——和高行健的对话 (253)
- 顾 城： 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
——与高利克的对话 (291)
- 西 川： 与弗莱德·华交谈一下午 (299)
- 王家新： 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
——关于当代诗学的答问 (309)
- 潘 维： 在时间丰腴的怀里
——答庞培问 (322)
- 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样？
——回答臧棣、王艾的提问 (330)
- 柏 桦： 诗人要勇敢，要有形象……
——答杨键、朱朱等 (346)
- 叶 舟： 我看见我正在变成一首诗
——答颜峻问 (357)
- 耿林莽： 更真实的我
——答《名人》杂志特约记者问 (370)
- 崔 健： 摇滚就是一种人性
——答马永波问 (378)



王蒙

访谈录

——答德国友人吴漠汀

关于小说

问：您在创作中有没有受到外国文学流派的影响，比如说创作风格多样化的影响？另外，您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哪一位？

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喜欢过许多外国作家，比如说俄国的和苏联的作家，像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法捷耶夫、费定等。另外，我也喜欢像德国的歌德、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以及美国的一些当代作家，比如我很喜欢 JOHN CHIEFER 的短篇小说。但是我从来没有专门把哪一个作家，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作为自己最崇拜的对象，或者是把他作为自己的 MOULD。

问：1989 年以后，您有一些作品在国外或者在香港发表，比如说《坚硬的稀粥》，另外您在国内也有一些散文集出版，比如说《红楼启示录》。您现在还在创作吗？

答：是的。但是我现在主要是写长篇小说，并不是把精力放在散文上。我的主要精力放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



关于散文

问：您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篇文章中谈了中国作家的非学者化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比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更加严重，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痞子文学”。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觉得“痞子文学”是另外一个问题。痞子文学可以说只是全部文学中的一种，这种文学的真正代表人物也不过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在整个文学世界里面，有一个像王朔这样的“痞子文学”，我个人觉得很好，我觉得中国完全可以有这样的文学。“学者化”也不是说人人都应该是学者，而是从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的作家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素养。另外“痞子文学”是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实质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说法叫“佯狂”，“狂”本来就是 BECRAZY。“佯狂”就是假的而不是真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批评，或者是一种嘲笑的方式。“痞子文学”采取的就是“佯狂”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对“痞子文学”也应该从更深的意义上来理解他们。

在创作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问：我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发现您的写作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您认为从《青春万岁》到《坚硬的稀粥》，您创作思想的变化主要在哪里？

答：我想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也许《坚硬的稀粥》还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我近年来的作品，因

为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一个是我去年初发表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最近《当代》杂志第三期(我希望您能在北京找到这本杂志)又发表了我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这两部长篇小说最能代表我在创作上的变化。我觉得在写《青春万岁》的时候,对人生是用一种非常浪漫的态度,认为世界就是光明的胜利和光明对黑暗的一种搏斗。现在世界对我来说是复杂得多了,我不认为我有责任或有权利或有能力把一切都告诉读者,说什么是光明的,什么是黑暗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们要这样,你们不要那样。在写《青春万岁》的时候,我充满了自信。我觉得我在告诉青年人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但现在来说,我是在把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把一种真实的内心的过程告诉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做出他的结论。

不愿重返政治舞台

问:您给我的印象是已经离开政治舞台,隐居起来,潜心著书,比如您写了《红楼启示录》。您今后是打算重返政治舞台,还是像南宋的辛弃疾那样不再过问政治?

答:我想我不会重返政治舞台了,因为对我来说我所有的经验已经足够了,我不想再往这方面走。但是,我也不是隐士,因为我不是隐居在家里,我也是全世界到处走,对一些社会的,以至于带有某种政治性的问题我还是关心的,在我所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仍然会发表我的意见。

问:如果现在政治上有变化,还请您出任文化部长,您会接受吗?

答:简单地说,我不想做部长了,因为我已经做过了,而且我想还是目前的这种状态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最近的活动和职务

问：自从不再担任文化部长以后，您除了发表了《红楼启示录》和那两部长篇小说等作品之外，您主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答：除了长篇小说创作和《红楼启示录》以外，我在国内外许多地方旅行，参加一些会议和讲学等活动，比如说去年我就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都不在北京。去年我曾经在美国的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和讲学三个月，然后又在香港的岭南学院一个月。我还参加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意大利、台湾等地举行的一些文化活动和文学研讨会。今年三月我在美国访问，四月在日本访问。至于国内的各个地方，我当然去得更多了，去年去了广东、山东等地。虽然我做的具体工作并不很多，但是我还担任了一本杂志叫《今日先锋》的名誉主编，同时也是《绿叶》杂志（这是一个有关环境的文学刊物）的名誉主编，另外，我也是《东方》、《寻根》杂志的顾问。对于一些文化和文学的刊物，我都力所能及地鼓励和帮助它们的出版。

关于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创作

问：您是著名的作家，发表作品毫不困难（1989年后的几年可能有一些问题）。我听说，现在中国有一些作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发表作品。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觉得这里头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一些青年人，他们是很有潜力的，非常有前途，但是他们没有经济能力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对这些青年人来说，我们就应该给予更多的帮助。

还有一些作家更值得担忧的是他们没有能力,不是没有经济能力来发表作品,而是没有足够的思想和艺术能力来创作出更新更好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在原有水平上原地踏步,所以读者就越来越少了。没有读者的作品,出版社也非常不愿意出。对于这样一些作家,我觉得就很难责怪出版商不愿出他们的作品了。

问:可以把台湾和大陆作家的经济生活作一比较吗?

答:当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情况。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了解过。我总的印象是,我觉得中国的大部分作家从收入和生活方面来说还比较稳定。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去年12月我到台湾访问,在台湾那种商业社会中,一个作家靠写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除了写那种畅销书,像琼瑶那样(当然她的作品都畅销而且写得又快又多),所以,有些很优秀的作家还要在大学里教书或者是在编辑部编书报。我不觉得中国大陆的作家在这方面特别困难,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

问:您认为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怎么样?

答:那当然是各式各样的,他们的生活还比较稳定,但只能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目前就是各人在做各人自己的事情。我想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关于文学与政治

问:文学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吗?

答:尽量减少这种影响。完全不受这种影响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希望能够逐步地、尽可能地减少这种影响。

问:您对中国政府的文学政策满意吗?

答:我想这个满意或者不满意只能是相对的,应该说比坏的时候要好得多,比起理想的境界当然还相差很远。

问: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作家担任过文化部长的只有您和郭

沫若先生。目前,捷克著名作家哈维尔当上了总统。您对文人从政有何看法?

答:不是郭沫若,而是茅盾担任过文化部长——茅盾就是沈雁冰先生。对捷克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也不想发表什么看法。就中国来说,我觉得在一般情况下作家最好不要担任政府的这种管理工作或行政工作的职务,因为毕竟一个政府对一个官员的要求和公众对一个作家的要求区别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想茅盾是在建国初期担任了文化部长,那时候由于革命胜利而带来了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气息。我担任文化部长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同样也因改革开放而带来了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憧憬,那里面也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有关系的。

关于经济与文学

问:您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文化事业会自然而然地随之更加开放吗?

答:第一,不会自然而然地开放,因为任何时候开放和不开放都是有冲突的,都是有矛盾的;第二,最后是会更加开放的。并不是任何一年,经济事业一发展就会开放一些。今年是1994年,如果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与文革刚刚结束时相比,比如说与1976年至1980年相比,中国的文学事业是更加开放了呢,还是更加封闭了呢?当然是更加开放了。但是具体到每一年,就有每一年的不同情况,有些年开放就显得比较明显一些,有时却给人一种收缩,甚至是管理得更加严格的印象。

问: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不太景气,人们追求消费,贪图享受,一切向钱看。这种现象对文学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首先,我觉得如果把所有的中国人都说成是一切向钱看的,我不赞成这样责备中国人,因为这只是极少数人,只是极少

数的商人被称作“大款”，就是“VERY RICHMAN”。我们如果来研究一下中国，会发现中国仍然有80%或90%的人还没有那种最起码的消费，没有最起码的消费水平，比如他们的服装很可怜，食品营养也还是不够，住房条件更差，交通条件非常困难。总的估计我觉得是这样。现在一般的青年群众和过去相比，对文化事业好像是被娱乐型的、消费型的吸引得更多一点。我想这也是一个过程，事实上什么时候都会有，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还是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很有学问的教授，也还有些很好的作家，也有许多年轻的学者，他们还是很追求在自己的文化或艺术领域里作出贡献的。

关于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

问：您认为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是应该加强呢，还是说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已经恢复正常？

答：我觉得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文学方面的交流是非常有趣的，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实际上，大陆已经出版了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台湾同样也越来越多地出版大陆作家的作品。另外，人员的互相访问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台湾一些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来过大陆，特别是一些诗人。大陆的作家最近也陆续地去台湾访问。在我之后，还有刘心武、汪曾祺，山西的李锐，上海的老作家柯灵等都去台湾进行了访问。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在台湾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也就是嘴上说的语言是一样的，对很多事情的思维方式，对海峡两岸都喜欢的和都不喜欢的东西，还是非常惊人地相似的。

张承志

美则生，失美则死

——答《环球青年》杂志

陆迪(以下简称陆):你的文学创作从小说开始,《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都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自《黑山羊谣》起,你陆续写了《海骚》、《错开的花》等三篇形式非常独特的作品,你称之为诗体小说,你谓之毕生之作的《心灵史》,融历史、小说、思想、诗于一体,已无法归类。近来,你又连续写了大量散文。文学离不开形式,你对自己文学形式的这种巨大变化怎样评价?你有什么新的创作意图?

张承志(以下简称张):我追求过形式,但也无法从理论上说清,究竟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诗和散文的划分。有一类人需要倾诉,文学几乎是时代留给这类人的惟一道路。我的形式变化恐怕都是受这种倾诉的愿望推动。《心灵史》起笔之前,我独自苦苦思索过它的形式,最后还是采取了我所描述的对象所拥有的形式:它只能是朴素的、褴褛农民的形式,泥巴和血污的形式。酝酿《心灵史》之际,我清醒地感觉到,我将跳入一个远离文学的海洋,在此之前,我必须有一次彻底的文学化的表现。我实现了一次放纵的写作,于是便有了那几个诗体作品,它们至今是我在艺术意味上的最高表现。倾诉在本质上只能是诗,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时间和心境再写几个像《错开的花》那样的彻底文学化的作品。

陆:也就是说,形式来源于感情,作家首先是人。那么你认

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格应该是什么呢？

张：对于美的追求。

陆：对于你，美究竟是什么？

张：真正的美常常只在底层民众的生存中，我感谢生活给了我机会和能力去感受这种美，庆幸自己生在一个深藏着美的国度。青年时代，草原给了我美的启蒙，那时我并不知道，美已经连同一种淳朴的自由意识进入了我的血脉。后来，以新疆为中心的中亚之美用它的天然浪漫彻底粉碎了中庸之道在我心中的价值，使我一辈子无法与之妥协。我在《心灵史》里描述的，更是一个我有过切身感受的美的集团，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遵循着美的准则生活，却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美，也丝毫没有向外界显示这种美的欲望。他们所象征的朴素的美已经彻底改变了我的精神世界。

中国曾是一个懂得美的民族。我们的文学中有过陶渊明、黄巢的咏菊和杜牧、毛泽东的咏梅；中国的穷乡僻壤蕴藏着知识分子缺乏感知的美的意识。今天流行的科学技术主义和价值观念上的商品味威胁着美感的生存，这里短见更是危险，因为，失美的民族将不可拯救，这曾是历史和规律。

如果说作家是一种职业的话，它是一种危险的职业。崇拜美的极致，这样的人生，不是闲适、淡泊，而是危险的生命。我在外蒙古的阿拉杭盖见过一种生长在火山口侧壁的美丽的树木，地狱口般的黑洞映衬着金箔似的黄叶。在黑锅火山，除开那种金叶树外没有其它生物存活下来。这偏激地证明着一个观点：美则生，失美则死。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深深感到，中文的美是不可抗拒的。但古典中文的美正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溶入神秘莫测的永恒。不管中文的美是否能让世界感受，只要我们有能力继续创造用中文写作的美文，厚重的中国文明就永远可能不被消灭。